

[文章编号] 1005 - 1597 (2020) 05 - 0074 - 07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对 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思考与贡献

■ 刘楠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失业问题比较突出。陈云高度重视并认真分析失业问题产生的根源,积极思考解决之法。他紧抓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主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端待举的复杂历史环境中,根据形势发展积极调整财政经济政策,对不同失业群体提出有针对性的举措予以解决。他坚持救济失业与防止失业并举,注意开源节流,着力发展经济、开展建设,不断创造新的就业环境,为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失业问题、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陈云;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失业问题;国民经济

[中图分类号] E297.5

[文献标识码] A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城市失业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仅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影响新生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因此,解决失业问题,对新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作为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紧紧抓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主线,创新思路,多措并举,破解了就业难、失业众的难题,走出了困境。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失业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加之长期战乱,造成大量人员失业。以上海为例,1948年10月,“全市户口总清查结果,本市人口总数为5448466人,失业人数常占百分之三十以上,难民亦常有二三十万人”^[1]。据参与接管工作的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一副秘书长周林回忆:接管之时,上海“人口约500万人”,“失业工人25万人,连店员及家属在内共达100万人以上。

[1] 《谈疏散人口》,《申报》1949年5月2日。

平民连家属在内,约有65万人。游民(包括乞丐、娼妓、扒手、流浪儿童、散兵游勇、吸毒者等),连家属在内约17万人;逃亡地主、恶霸连家属在内约10万人”。^[2]大量失业人员连同闲散游民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安定的重要隐患。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电厂被炸,全市70%工厂停工。“原来基础薄弱之上海工商业,积毒迸发。工厂原材料严重缺乏,资金短绌,销路不振,亏损、倒闭、停工、失业逐渐严重。这种情形从中小厂发展到大厂,从单家独户发展到整个行业,劳资纠纷增多、失业增加、人心浮动,出走香港的资本家人数激增。”^[3]这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失业。1950年3月12日,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向中央致电报告上海面临的困难情况,2月份全市劳资纠纷案达592件,失业工人已达13万,由工人失业、缺薪引发子弟交不出学费,致使3月开学时全市中小学有30%要关门,又新增一批学生要失学。^[4]陈毅于4月4日、15日、21日三

[2] 周林:《接管上海的日日夜夜》,《城市接管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47-548页。

[3] 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编《陈毅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页。

[4] 参见《陈毅在上海》,第239页。

次向中央致电汇报上海失业等情况，其中4月4日报告“失业职工可能增至20万，连同家属要救济的将要超过50万人”^[1]。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失业问题。会上谈到上海失业最为严重，失业工人当时已达到15万人，还可能继续增加。据报告显示，1950年4月，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统计失业人数为161937人，到5月中旬失业人数增到196292人，连同半失业工人，总计258836人，若照一个失业工人负责两人生活计算，包括家属在内则达6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12%。^[2]

除了上海，南京、广州、重庆、常州、唐山等其他一些大中型城市也面临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据1950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当时全国大中城市失业工人总数约近120万人。^[3]截至当年年底，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镇待业人口达到437.6万人。^[4]激增的失业人数对城市政权的稳定造成很大威胁。

全国失业严重的情况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0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中指出：“最近几个月来，各地工商业由于物价稳定及其他种种原因，发生了相当严重的萧条现象，有不少工厂停工、商店倒闭，大大增加了工人的失业痛苦。”“失业工人的生活极为困难，已连续发生因生活无出路而自杀的现象，同时也就发生了一些不满的情绪。美蒋特务分子乘机造谣煽惑，企图挑拨工人来反对我们，在个别地方已有部分工人受欺骗煽惑，反对工会，殴打我们干部的事实，这是异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稳定工人群众的情绪，争取工人群众对我们的坚决无保留的拥护，将会造成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的

重大困难，甚至可以动摇到城市人民政权的基础。”^[5]如何妥善有效地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亟待解决的一个重点难题。围绕这一问题，当时负责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根据国内的经济实际，作出了一系列思考，并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

二、适时调整工商业，改善就业环境

面对解放后全国经济面临的诸多困难和考验，中国共产党在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的基础上，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利的经济措施。以陈云为主任的中财委沉着应对，在经济战线上打赢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沉重打击了不法投机资本，使国营经济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在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从调查研究入手，集中精力抓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这两件全局性的工作。1950年初，全国基本上实现了物价稳定和财经统一，为人们生活走向基本安定创造了条件。

经济战线上取得的基本胜利使全国的困难状况开始好转，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通过整顿金融市场和打击不法投机行为，一度因货币贬值导致抢购囤积货物的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随之也出现了一些市场需求不足、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职工增加等现象。1950年5月5日，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致电陈云、薄一波反映稳定物价后出现的问题：“湖南目前市场萧条混乱，许多工商业关门倒闭，失业现象更趋严重，许多厂商无款缴纳税收，市场情况与人们不满日益严重。”^[6]

陈云在主持全国财经工作过程中始终关注市场动向和经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1950年5月8日至25日，中财委召开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

[1] 《陈毅在上海》，第240页。

[2] 参见《上海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1950年救济工作总结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编号B129-1-10。

[3] 参见石础：《失业与失业救济》，《人民日报》1950年6月30日。

[4] 参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6] 《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0页。

局长会议，陈云在会上强调，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解决从四月份以来商品滞销、生产减缩、商店歇业和工人失业增多等问题”^[1]。陈云注意到，1950年“三四月间全国新增加的失业职工约十万人，其中上海五万，武汉二万五，天津一万四。实际上不止此数。全国各大城市的失业人口约三十八万至四十万人。全国失业人口总数已达一百一十七万人（包括东北的十二万五千人）”。他指出：“现在工商界主要的困难，是商品滞销，由此而引起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加。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不仅发生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且遍及许多中小城市。”^[2]为了解决商品滞销等困难，陈云提出“重点维持生产”，“开导工业品的销路”，“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经营管理”，“重点举办失业救济”^[3]等五种方法，与稳定金融等一系列政策相辅而行，以达到活跃市场、减少失业的目的。随着商品滞销局面逐渐扭转，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在1950年“面粉、大米、棉纱、棉布四种主要商品的销售量，10月份比4月份分别增长54%、289%、128%和133%”^[4]。

解决商品滞销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和工商业存在的问题，工商业仍然存在不景气的现象，失业问题仍然突出。陈云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市场和工商业出现这些困难的主要原因：除了因为长期战争、人民购买力大大降低等因素外，“一是通货和物价的稳定，暴露了同时又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市场上若干物资一时供过于求，生意不好，许多工商业者发生困难”；“二是过去适合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发展起来的若干工商业，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消灭，许多货物失去市场，另有许多货品也不合人民需求的规格”；

[1] 《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第71页。

[2]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

[3] 《陈云文选》第2卷，第90页。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

“三是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企业经营方法不合理，成本高，利润少，甚至还要亏本”；

“四是经济中的盲目性，同一行业内部盲目竞争，地方与地方之间供求不协调，这也引起许多企业减产、停工和倒闭”。^[5]陈云的这些分析不仅指出了市场上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还进一步为解决失业问题、改善就业环境、制定调整政策指明了基本方向。由此，陈云提出了关于调整工商业的几个问题，将工作重点放在调整公私经济关系上，逐步恢复市场主体活力，克服因市场波动导致的失业问题。

1950年6月6日至9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陈云紧紧围绕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这一总任务作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发言。陈云在发言中指出，在调整公私关系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讲的五种经济成分，即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统筹兼顾是必须要注意的。^[6]从这篇发言中可以看出陈云通过调整工商业来缓解失业问题的基本思路。

首先，以国营经济为基本依托带动生产。国营经济可以稳定社会经济。以国营经济为依托，意味着国家重点计划和发展的国营企业能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从而带动其他成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陈云明确指出：“国营经济是一切经济成分的领导力量”^[7]，要增加工商业中国营的比重，使国营经济具有相当的力量。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应该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次，鼓励私营企业工厂克服困难恢复生产。陈云指出：一些只适应旧经济条件的畸形发展的工厂在新条件下很难维持，这些工厂的倒闭就意味着工人有暂时失业的危险。“有些工厂则是可扶可倒，我们就要力求把它扶起，使它不要倒。有人说：‘倒就倒吧，迟倒不如

[5] 《陈云文选》第2卷，第101页。

[6] 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第92页。

[7] 《陈云文选》第2卷，第103页。

早倒。’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工人来讲，在业无论如何苦，总比失业好。”^[1]“私营工厂可以帮助增加生产，私营商业可以帮助商品流通，同时解决失业问题，对人民有好处。”^[2]可见，私营工厂是当时市场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只有帮助它们摆脱困境实现转型，才能使市场活跃起来，从而降低失业风险。

再次，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统筹兼顾其他经济。一方面，陈云提出五种经济“大家夹着走”，“既照顾到我们这一边，也要照顾到他们那一边。否则资本家的企业就会垮台，职工失了业就会埋怨我们”^[3]；另一方面，要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私营经济跟着走。陈云指出，为使公私关系取得一定的协调，建议“由政府和企业委托私营工厂加工及向私营工厂订货”，刺激私营企业恢复和扩大生产，产品也由国家收购包销。同时“联合公私力量，组织工业资金的周转”，“有步骤地把国营企业以外各机关、各部队、各团体分散经营的生产事业统一起来，并加以调整，使之与私人企业、手工业和农民副业相协调而不相冲突”^[4]。

中共中央和以陈云为主任的中财委集中力量调整工商业，几个月后，在国营经济的带动下，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情况大为好转，商户从歇业多、开业少，转变为开业多、歇业少。据统计，到1950年下半年，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无锡、张家口等十个城市，私营工商业开业的共有32674家，歇业的共有7451家，开业超过歇业25223家。^[5]陈云1950年12月1日在政务院第六十一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自当年5月以来，“纱布及其他工业品的生产量都增加了，上海的纸烟生产量已达八万五千箱”；乡村和城市的消费能力也普遍提高，老百姓消费的粮食由原来的1/3面粉、2/3杂粮转变为2/3面粉、1/3杂粮；

5月以后，广东积存了3年的土产售罄，“城市的失业现象，目前已不太大”，而且“税收很旺”。^[6]为进一步活跃经济，保护在业工人不失业，减少失业现象，陈云还提出，要“扩大农副产品的购销”，由此增加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发展，减少城市失业现象的同时又能保证国家税收。^[7]市场的活跃不仅缓解了失业问题，降低了失业风险，还为社会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大大改善了城市的就业环境。

三、根据不同失业群体的不同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的失业人员主要包括工人、商人、知识分子、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旧公职人员、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无业游民以及原来为官僚服务的雇工等。陈云根据失业人员中不同群体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了有针对性的举措来解决失业问题。

关于旧公职人员的问题，陈云支持中央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认为这在政治上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全部接收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财政上负担很大，但是，裁了这部分人，让他们失业，没有饭吃，问题更大。”“退一步讲，就是裁也不可能全部裁掉，大部分还要用，裁掉的只能是少数。”“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同时陈云还强调，对于要裁掉的人，也要集中训练，讲清道理，“对旧人员要训练、改造和使用，这个包袱不能不背，不能光从财政着想”。^[8]这样，被裁掉的旧公职人员也能通过训练班进一步接受学习和改造，逐步找到谋生之路。

城市失业人员大部分是失业工人，这一部分群体大多饱受失业之苦，生活非常困难。1950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失业问题，陈云就毛泽东询问能否拨4亿斤粮食救济失业工人的问题，表示“救济经费是可以拿出来的”，但同时表明“方式应该研究”。4月

[1] 《陈云文选》第2卷，第21页。

[2] 《陈云文选》第2卷，第92页。

[3] 《陈云文选》第2卷，第93页。

[4] 《陈云文选》第2卷，第104页。

[5] 参见《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10页。

[6] 参见《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191页。

[7] 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第118页。

[8] 《陈云文选》第2卷，第15页。

20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地办理失业工人的救济”,同时要求各地有必要时以实行临时救济为主。^[1]5月8日,在中财委召开的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期间,陈云还分组开会讨论了劳动部提出的救济失业工人办法草案。6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两个《指示》要求救济失业工人的各市设立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采取以工代赈、生产自救、专业训练、回乡生产、帮助教育及发放救济金的办法救济失业工人。^[2]此后,各地人民政府和工会的救助办法已先后由临时的紧急救济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长期救济,成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专门负责此项工作。^[3]随后各级政府也相继制定了本地区的救济办法。随着救济工作的开展,截至1950年12月,失业工人再就业共543821人,正在救济中总计789937人,占全国当时失业工人的59.7%。若将家属包括在内,得到救济的约200万人以上。^[4]

除开展救济工作外,陈云还提出了让一部分失业工人转业的想法,“有的行业要发展,不合社会需要的行业要倒台,要转业”^[5],虽然劳动力的转业是较为困难的,但是“不论在大中城市或小城市,转业都是可能的”^[6],职工转业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陈云指出,目前的熟练工人数量也不够,“现在需要很多的熟练工人、职员,更需要技师”^[7],可以让失业人员参加相关的培训以实现转业再就业。他还建议尽量把失业者组织起来参加国家公共工程,

例如兴修水利、修建市政工程等。^[8]

知识分子在旧中国数量很少,党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对于不适应新社会的失业的知识分子,陈云认为协助其转业以适应新经济形势的需要尤为重要。他指出,在大城市中,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分子的数量是很大的,“转业有迟早,但一定会转过来”^[9],以此鼓励失业的知识分子再就业,参与国家建设。除了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改造、培训促其再就业外,陈云也强调要在文化教育上增加投入。他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多,毕业就是失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0]“知识分子不但不会没有出路,而且会嫌少。”^[11]

对于如何解决因各种原因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陈云提议,适当减轻农业税,从增加农产品销路入手,除国营贸易机关收购外,还鼓励合作社和私商收购。^[12]这样既保护农民的正当生产利益,又增加了农产品销路。反过来,农产品的畅销又促进了农村的扩大再生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重新返乡。

由此可见,在具体解决城市失业问题上,陈云从实际出发,以人民为本,针对不同失业群体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对策。事实证明,这些举措是行之有效的。

四、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经济 解决失业问题

陈云认为,失业问题与经济工作有密切关系。早在主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时,他就指出,“经济不发展,其他不会发展。总的应摆在此点,最大精力放在此点”^[13]。陈云任中财委主任后,面对当时全国严重的失业问题,选择将恢复和发展经济发展作为解决失业问题

[1] 参见《建国初期社会救济文件选载》,《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2] 《建国初期社会救济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3] 参见《各地人民政府和工会组织用多种方式救济失业工人》,《人民日报》1950年6月19日。

[4] 参见毛齐华:《一年来救济失业工人工作的成就》,《人民日报》1951年5月1日。

[5] 《陈云文选》第2卷,第176页。

[6] 《陈云文选》第2卷,第149页。

[7] 《陈云文选》第2卷,第136页。

[8] 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第104页。

[9] 《陈云文选》第2卷,第149页。

[10] 《陈云文选》第2卷,第136页。

[11] 《陈云文选》第2卷,第149页。

[12] 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第105页。

[13] 《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1页。

的治本之策。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致使原定的经济建设计划不得不暂时放缓,政府需增加财政收入保证国防需要。为此,陈云着手制定与抗美援朝战争相适应的财政经济方针,认为要开源节流,削减经济建设投资,增加政府的税收。与此同时,陈云还考虑到另一层面,增加税收会使农民负担增重,农民将没有余力购买城市工业品,而这又会导致商品滞销,工厂倒闭,引发一批城市工人失业。如何提高农民购买力,保护在业工人不失业,不增加失业比重,维持经济正常运转,成为陈云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陈云提出,“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陈云举例分析,“一户农民养一只母鸡,一年下二百个蛋,把它销出去,每个二百五十元(城市价五百元),就可以收入五万元,合五十斤小米”^[1]。农民收入高了,这样从50斤小米中拿出十几斤交给国家,农民是可以负担得起的。采用此方式,一方面保证了国家的税收,减轻了财政困难,使经济恢复平稳进行,一方面又成功避免了城市工人失业。

1951年初,在国民经济明显向好、抗美援朝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形势下,2月14日至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方针。陈云迅即落实中央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指示精神,在1950年12月通过的1951年国家财力使用方针的基础上增加了“城乡交流”“农业生产”“经济核算”“财政纪律”“建设准备”等五项财经工作要点,把“建设准备”列为1951年重点目标任务之一。^[2]4月24日,陈云又进一步调整了财经工作要点,主要有“城乡交流”“农业增产”“经济核算”“统一管理下的因地制宜”“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整顿财经队伍”六点,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释。^[3]

[1] 《陈云文选》第2卷,第118页。这里的“元”,指的是当时流通的第一套人民币。

[2] 参见《陈云文集》第2卷,第217页。

[3] 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第127-139页。

随着国内外形势进一步发展,中央提出“边打(边抗)、边稳、边建”方针。在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尚未解除之前,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无疑是比较困难的。陈云指出,国防支出比重大,加之“劳资关系问题还会长期存在”^[4],而且经济改组周期很长,“好转的部分会继续好转,淘汰的现象也还会继续一阵”^[5],这些都易引发失业。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挑战正步步升级,前方要抗美援朝,后方要稳定市场,现在又多了一个建设的担子,陈云自己说:“我脑筋里考虑的问题,重点常在这里。”^[6]如何在特殊时期解决失业问题,搞好经济建设的准备呢?陈云提出,“要用政府和劳资双方的力量解决经营情况下降的问题,不致造成大量失业”^[7],保护在业人员安稳工作;鼓励私营工商业发展,扩大就业;地方要积极指导和协助劳动力的转业和资金的转移。^[8]在此策略的指引下,“全国工商业进一步恢复,就业人员增加,失业人员减少,生产、税收、贸易额都在增加”^[9]。1951年7月底,全国29个城市失业半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仅余45万人^[10],国民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为维护国家安全、争取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同时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在财政上一般可以节约百分之二十”^[11]。

陈云密切注意开展运动后全国金融物价变化情况。物价一反每月上涨百分之之一的情况,开始出现下落,同时市场局部出现轻工业品过

[4] 《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第137页。

[5] 《陈云文选》第2卷,第148页。

[6] 《陈云文选》第2卷,第194页。

[7] 《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第137页。

[8] 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第149页。

[9] 《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第177页。

[10] 参见《陈云文集》第2卷,第316页。

[11] 《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第213页。

剩情况。上海棉布、百货除名牌货销路趋平外，一般商品则呈现过剩。陈云拟采取由贸易上包收的政策，备秋后供应。^[1]为不影响农业生产、城乡交流，陈云特意指出，春耕季节要稳定城乡交流，避免城市工人失业。^[2]但是，一些地方还是出现了业务停顿的问题。陈云建议，加强市场流通，推动企业正常生产。此外，陈云又提出采取收购、订货、加工、调拨、放款等办法，活跃城乡交流，防止造成大量人员失业。此后，他还专门向各大区财委负责人指示，要迅即恢复财经业务工作。^[3]

1952年初“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然而各地在实践“五反”运动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工商业发展面临一些困难。陈云注意到此问题，在4月11日召开的政务院政务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要通过做工作，鼓励资本家的生产和经营，使工商业繁荣起来”^[4]。4月19日，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又指出：“要能使工商业继续下去，所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和一部分商业，我们都要鼓励他们生产。”^[5]

陈云认为，一方面城乡“因为‘五反’，搞得不通气了”，工业品的流通不是从大城市直接到小城市，而是由大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到小城市，最后到初级市场。^[6]另一方面，“资本家还未喘过气来”，市场物价下跌，交易停滞，营业萧条。^[7]

面对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做呢？陈云牢牢抓住恢复和发展经济这个中心。1952年12月5日，陈云就解决上海失业问题回信上海市委负责人，对上海失业问题严重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上海严重的失业问题，在短期内是很难避免的。从总的趋势看来，在国家经济建设尚未大规模开展以前，要彻底解决上海的失业

问题，不是容易的事情。”“失业问题与经济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但在目前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即不能用经济建设去迁就解决失业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六点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包括各地根据建设计划对人员的需要，招纳一些年富力强的青年职工并进行训练；对于游民等闲散人员根据公安部的计划管理并视地方能力对这些人进行改造；尽可能维持目前上海的工业生产，尽量予以照顾；研究妥善办法以控制人口大量流入；对于某些地区必须发展的企业拟适当提高工资，等等。^[8]

陈云对解决上海失业问题的回信充分体现了他几年来思考解决失业问题的治本之策——发展经济和开展建设。他对各地财委及财经工作者提出要求：“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要注意节省开支，但更要注意增加收入。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9]

经过艰苦努力，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城市失业问题的严峻局面也得到有效缓解。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全国共有约220万余人重新就业。即使在全国解放比较晚的西南地区，从1950年至1952年9月底，有27万多人得到就业机会，约占全部登记失业人员总数的3/4。^[10]正是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这些失业人员开辟了广阔的就业道路。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与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以人民为本，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和有效举措，为新中国解决失业问题、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刘楠，陈云纪念馆助理馆员，上海201715]

(责任编辑：宿凌)

[1] 参见《陈云文集》第2卷，第332、334页。

[2] 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第195页。

[3] 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第207页。

[4] 《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第211页。

[5] 《陈云文集》第2卷，第393页。

[6] 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第168页。

[7] 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第218-219页。

[8] 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第188-190页。

[9] 《陈云文选》第2卷，第18页。

[10] 参见《全国各地三年来劳动就业和失业救济工作获显著成绩》，《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3日。